

内蒙古文史资料选辑

第五辑

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编

目 录

旅德华侨抗日救亡运动	秦丰川(1)
国民党接收包头前后见闻	刘映元(15)
解放战争时期美国“调处”的真相 ——“三人小组”在绥远	刁可成(33)
集宁战役前后	贾璜 任崇玉(39)
涑水战役——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之死	刁可成(47)
傅作义的干部队伍与第七集团军政训处	刘映元(51)
记“九·一九”绥远起义前后几桩事	信务本(66)
国民军进驻绥远时期 ——纪念五原警师六十周年	刘映元 张静文(72)
北平和谈与联合办事处	刁可成(90)
一场反苛政反贪官污吏的斗争 ——忆绥远省“三·二八”难民大会	卜放夏(97)
世远堂旧话	赵国鼎口述,刘映元整理(101)
王氏义和堂的兴衰经过	王可胜忆述,刘映元整理(171)

旅德华侨抗日救亡运动

秦 丰 川

一 在法西斯的反动统治下

从1933年冬到1937年冬，我在德国柏林留学，亲眼看到希特勒在攫取德国政权之后，实行着法西斯的反动统治。整个德国变成了人间地狱。

中国的蒋介石，处处学习希特勒。他不但在军事上利用德国的军火，屠杀中国的人民，聘请德国的顾问，指挥“剿共”的战争，而且在政治上采取德国的办法，实行法西斯的统治。为了和希特勒进一步勾结，他把驻德公使馆提升为大使馆，免去职业外交官刘崇杰的公使职务，特派中统头子程天放担任驻德大使。程天放到任后，同蓝衣社（即复兴社）一道，和德国法西斯勾结，派特务利用各种机会，对中国侨民的抗日救亡运动，实行镇压。

以程天放为首的驻德大使馆，成了一个对侨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工具。它迫害留学生的罪恶活动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第一、控制学业成绩证明，限制抗日救亡活动。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有这样一条规定：凡是公费留学生，在每学期终了，必须向学校取得学业成绩证明，交大使馆翻译、盖章后，连同原件，寄回政府，才能领取下学期的学费。否则，公费就会停止，学业就会中断。大使馆就利用这个职权，对留学生进行思想审查。凡是他们认为政治上没有问题的，就可以很快地得到证明；凡是他们认为有“共产党嫌疑”的，就会遇到百般刁难，使你的生活、学习，受到很大影响。甚至有的人根本得不到证明，只好中途退学。第二、进行特务活动，陷害进

步学生。大使馆的武官，是蓝衣社头子之一的酆悌，他整天通过蓝衣社的学生，对进步学生进行侦察，遇到他们认为是共产党员的学生，就用两种办法对付：一种办法是在你准备回国的时候，就实行监视，在你启程以后，就把你走的日期和路线，报告国内特务组织，你刚刚上岸，就会失踪；另一种办法是指名你是共产党员，向德国警察告密，使你突然遭到逮捕。在柏林人所共知的，就有刘光德被捕事件和许德瑗、杨一之、李德、李康等人的被捕事件。第三、利用“党国要人”讲演，欺骗恐吓青年。大使馆每遇所谓“党国要人”到柏林，就要举行欢迎会，请他们讲演，报告国内形势。侨民久居国外，当然愿意知道一些国内情况，每次都有不少人前去听讲。可是这些讲演，都是鬼话连篇，听了使人生厌，记得戴季陶大讲新生活运动，根本不提民生疾苦；蒋廷黻高谈“安内”政策，丝毫不涉及对日抗战问题；邓文仪、桂永清之流，则更是专门宣传法西斯运动，让人信仰“至高无上的领袖”。对于这样的讲演，谁如果听得不耐烦，中途退场，就会被特务注意，认为有政治问题，随时找谁的麻烦。

在大使馆的指使之下，柏林成立了一个“留德学生会”，由蓝衣社重要分子把持，具体搞特务破坏活动。该会的理事、监事，如黄远晟、陈介生、陈懋、吴北棠、魏华昆之流，都是军统和中统的特务分子。他们有机会就和进步学生捣乱。这个“学生会”的特务活动，主要有以下几种办法：第一、利用“学生会”的组织，进行特务侦察。“学生会”设有一个简单的阅览室，里边陈列着国内出版的各种报纸杂志，也设有一个游艺室。学生们想多知道一些国内情况，就去“学生会”看书看报、打球、下棋。“学生会”的特务，对这些人特别注意。经过他们的考察，认为你的思想“可靠”，就要拉拢；认为你的思想“不稳”，就要打击。第二、派遣伪装进步的特务，打入抗日救亡的团体，秘密地进行着监视，遇有问题，就向“学生会”报告。记得有一个军统特务，名叫王德晋，是河南人，就曾伪装老实进步，打入“华北救亡会”，并且几乎打入“反帝大同盟”。以后大家发现，几次特务

破坏活动，都是他告密的。第三、收买华侨小商，进行公开捣乱。在柏林，经常有一百来个华侨小商，他们多年流居国外，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，一贯受法西斯的欺骗宣传，蓝衣社对他们之中生活特别困难的人，实行收买，专门指使他们在公开场合和抗日团体捣乱。另外，“学生会”还帮助侨商，开设了两个小型食堂（一个开设在一条街的四号，所以简称“四号”，一个开设在另一条街的五号，所以简称“五号”）。名义上是为了便利学生吃饭，实际上是侦察和监视学生活动的场所。谁要是对于不抗日的“政策”发了牢骚，谁就有可能接到“忠告”，有的人甚至会因此被德国警察逮捕。许德瑗等人被捕的原因，主要就是由于常在“四号”、“五号”，攻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。

二 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

在我留德的四年当中，旅德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，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，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：第一个阶段是从1933年冬到1935年冬。整个亚洲、欧洲、非洲，都弥漫着法西斯的侵略战火。从国内形势讲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，并逐步向华北五省侵略，蒋介石奉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，中国红军则进行着二万五千里长征，旅德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，处在酝酿时期。第二个阶段是从1935年冬到1937年夏。国际形势虽然继续恶化，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侵略中国，进一步向华北进攻，诱迫蒋介石向它全面投降，但是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经过“一二·九”运动和“双十二”事变，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反共的内战，在全国范围内，形成了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。第三个阶段是从1937年夏到是年冬。这时国内已经发生了“七七”事变，蒋介石被迫也参加了抗战，红军已经改编为八路军，正式开到前线抗日，全国人民已经动员起来，开始了全面抗战。这时，旅德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，也随之进入一个“国共合作”的阶段。这时蓝衣

社一面被迫承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一面并不放弃反共反人民的立场，他们表面参加抗日团体，实际进行破坏活动。因此抗日团体不得不对他们采取有团结、有斗争的办法。这是旅德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总的形势。下边我再谈一下这个运动的具体发展过程。

在旅德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过程中，始终居于领导地位的是中国共产党。党通过自己的外围组织“反帝大同盟”，领导着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。在双重敌人，德国法西斯和中国蓝衣社的严密统治下，“反帝大同盟”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组织，出版着自己的刊物《海外论坛》。这个刊物的主要内容，有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的论文，有介绍国内抗日运动的新闻，言论尖锐，文字锋利，深受进步学生的欢迎。但是蓝衣社的特务，则一直把它看作眼中钉，每次出版，都要到处侦探，企图“破案”，可是一直没有找到他们认为可靠的线索。到1932年底，在宋庆龄等领导的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成立之后，“反帝大同盟”停刊了《海外论坛》，改出《动员》月刊。这个刊物的发行数量比较大，能看到的人也比较多，因此所起的影响也比较广泛。这个刊物每出一期，都要在留学生中引起一次波动：进步的学生是秘密传送，互相讨论，希望通过它找到领导抗日的组织；特务分子是左右打听，进行恐吓，企图减弱它的影响。到了1935年冬天，由于蒋介石专搞内战，不肯抗日，眼看华北五省又要沦陷，由于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国内的抗日运动正在发展，于是在留德学生中，突然出现了两个比较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：一个是华北五省学生组织的“华北救亡会”，出版《救亡》月刊；一个是以两广学生为中心组织的“蹶起社”，出版《蹶起》不定期刊。这两个刊物的基本主张是：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；要求立即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；反对华北五省“特殊化”。因为“华北救亡会”有“反帝大同盟”的同志参加，因此《救亡》的立场更坚定，言论更彻底，也更受到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欢迎。其中《论蒋介石》一文，曾在留学生中得到广泛的传诵。到1936年春天，在《动员》和《救亡》的提议下（实际就是在

党的提议下),成立了“旅德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”(简称抗联会),出版了《抗联会刊》。从此旅德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,进入一个公开活动的阶段。不久以后,会员由学生逐步发展到侨商,组织由柏林逐步发展到外城。

“抗联会”的会员有团体、个人两种,它包括了主张抗日的各党各派的成员,也包括了爱国的无党派民主人士。开始成立时,以“反帝大同盟”关系参加的人,有江隆基、张铁生、朱江户、乔冠华、许德瑗等;以“华北救亡会”关系参加的人,有温朋久、张德馨、刘文华、姜书剑、孙继中、秦丰川等;以“蹶起社”关系参加的人,有温康兰、赵一肩、张炎、梁节曾等;第三党方面的有黄琪翔、连瑞琦、王深林等;国民党反蒋派方面的有王南羲、万臻之等;无党无派方面的有王季陶、朱木美、郭兆麟等。到1936年冬天,“抗联会”的会员,便发展到一百多人。“抗联会”采取委员制,对外由黄琪翔负总责,委员会下设宣传、组织两个部,由朱江户、秦丰川分别负责。会员按团体或地区编组,经常进行活动。《抗联会刊》按月出版,赠送会员和有关方面,有时还出专刊,讨论专门问题。记得出过一本《击亡国的准备论》专刊,从国际形势、国内形势、军事、经济各方面,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提出的“准备论”,在全欧华侨中起了很大的影响。

和旅德华侨的情况一样,在法国、英国、比利时等国的华侨中,也都展开了抗日救亡运动;国内主张抗日的名人,也有一部分先后来到欧洲活动,于是把全欧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国内的抗日运动汇合起来,于1936年9月间在巴黎召开了“全欧华侨抗日救亡大会”,出席大会的,有旅英华侨代表团,主要成员有王礼锡夫妇、黄少谷夫妇、胡秋原夫妇等;有旅德华侨代表团,主要成员有黄琪翔夫妇、赵一肩夫妇、秦丰川夫妇、江隆基、朱江户、王深林等;有旅法华侨代表团,主要成员有雷子声、罗琼、陈柱天等;还有不少侨商代表,但姓名记不得了;有旅比华侨代表团,主要成员有冯希勃夫妇等。参加大会的,还有从国内刚到欧洲的反蒋人物,如陶行知、方

振武、钱俊瑞、陈铭枢等。大会开了两天，除由各国代表团报告工作外，还有不少人在大会上发了言。记得有两个发言，发生的影响最大：一个是党在欧洲的机关报《救国时报》负责人李昆（吴克坚）同志的发言，他说明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，说明了抗战必胜的主客观条件，号召各党各派团结一致，共同抗日。这个发言系统深刻，合情合理，使人人信服。另一个是清华大学女生陆瑾同志的发言，她介绍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经过，介绍了当时国内抗日运动的形势。她的发言生龙活虎，有声有色，使人人振奋。大会最后通过《告全欧华侨书》，号召全欧华侨和全国同胞紧密团结，促进全面抗战的早日实现。对于这样的大会，蓝衣社特务虽然没有放弃捣乱破坏的阴谋，但是由于各个代表团团结合作的很好，使他们没有得逞。大会圆满地闭幕了。

大会闭幕之后，旅德华侨代表团的成员就分成两组活动：一组人赶回德国，及时向“抗联会”会员传达大会精神；一组人留在巴黎，向各方面学习工作经验。我们留下的几个人，主要作了以下活动：一、和陈铭枢一道，参加了巴黎郊区华工的座谈会，听取了华工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介绍，汇报了德国侨商的痛苦生活状况。华工热爱祖国的思想表现，使我们深受感动。二、和法国、英国代表团的部分成员，举行了座谈，进一步交流了工作经验，建立了经常的联系。总之，通过巴黎的大会，使旅德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，又向前推进了一步。

“七七”事变一声炮响，全国展开了抗日战争。这消息使每一个“抗联会”会员感到鼓舞，干劲比从前更大了。不论“四号”、“五号”，不论家里、街头，人们见面，都谈着抗战消息，论着国共合作。可是蓝衣社分子，却陷于垂头丧气、狼狈不堪的境地。很显然，这时他们是处在极端的矛盾中。他们不谈抗日不行，因为抗战已经起来了，不能再说“主张抗日就是共产党”；他们谈抗日也不行，因为他们盼着抗战停下来，继续反共反人民。可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，抗战

并没有停下来,因此他们也不得不开始言不由衷地说几句抗战的话。“抗联会”为了扩大抗日救亡运动,就在这个时候派出代表,和“学生会”谈判合作抗日。他们虽然没有拒绝,但也并不积极欢迎,而是采取了阳奉阴违、拖延时间的办法。直到九、十月间,他们才被迫谈判合作,但是提出了几个无理条件:一、解散“抗联会”和它的团体会员,另组抗日团体;二、停刊《抗联会刊》和《救亡》,另出抗日刊物;三、一致拥护“蒋委员长”;四、办公地点设在“学生会”。“抗联会”会员对于这些条件,万分气愤,一致指出:蓝衣社一贯反对抗日,过去想用特务手段,消灭抗日团体,没有办到;现在抗战开始了,反而想用和平办法,让我们投降,更办不到!以后又经过几次交涉,再加上形势发展对他们的压力,才终于达成了这样的协议:一、“抗联会”和“学生会”共同成立“旅德华侨抗日救国会”,“抗联会”的团体会员是否单独存在,由它们自己决定;二、停刊《抗联会刊》和《救亡》,另出《救国周报》由双方共同编辑(“抗联会”参加编辑工作的是乔冠华、温朋久、刘文华等);三、办公地点可以设在“学生会”,但“学生会”要对“抗联会”会员的安全负责;四、同意“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”的口号。关于这个口号,在大会、小会上争论过许多次,蓝衣社始终没有正式同意,最后只是含糊其词而已。根据这样的协议开始工作后,“学生会”不久便发现他们是跟着“抗联会”走了,于是又用各种借口,实行怠工。他们的编辑,自己写不出文章,又不同意登载我们的稿子,争来争去,使《救国周报》不能按期出版。我们识破了他们的破坏阴谋后,又恢复了《救亡》月刊,继续领导抗日运动向前发展。在这种又团结、又斗争的局面中,蓝衣社因为是反共内行、抗日外行的关系,眼看起不了领导的作用,只好逐渐在工作中销声匿迹了。

1937年9、10月间,在巴黎召开了第二次“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”。这时国内抗战已经开展,杨虎城将军正准备回国,因此各个代表团中有一部分人愿意提前回国,参加抗战。经过协商,共同组

织了一个“旅欧华侨抗日团体回国代表团”，和杨虎城将军同船回国。代表团不但在沿途和杨虎城将军一道，作了抗日宣传，而且回到武汉，还向抗日的各党各派，汇报了全欧华侨抗日运动的情况。这在当时蒋汪准备投降的形势下，也曾起过一点呼吁继续抗战的积极作用。

三 几次面对面的斗争

现在，就我记忆所及，谈谈“抗联会”和蓝衣社进行面对面斗争的情况。

1936年夏天，“抗联会”刚刚成立不久，世界运动会便在柏林开幕。中国代表队除符保卢的撑竿跳高取得复赛权外，没有一次得分，特别是第一场足球输给日本队，使人十分气愤。但是对于这种结果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：蓝衣社认为是运动员不努力，骂运动员给国家丢脸；“抗联会”认为是反动政府不重视体育，责任不在运动员身上。为了表示这种看法，“抗联会”就印刷了一批慰问信，派人送到运动场。运动员看了慰问信，非常感动，就和“抗联会”建立了联系。但是这消息很快就被蓝衣社知道了，他们一方面在运动员中造谣恐吓，说是共产党散了传单；一方面对运动员实行拉拢监视，企图隔绝他们和“抗联会”人们的来往。“学生会”会长黄远晟，天天开着汽车，出进运动场，去玩弄“美人鱼”（女游泳运动员杨秀琼的绰号），监视共产党。不料有一天，因为雨后路滑，快车竟然撞到一棵树上，弄得车翻人亡。

在运动员回国以前，“抗联会”在天津饭店举行欢送会，蓝衣社先是阻挠运动员，不让来参加。但竟然还有四、五个运动员，冒着危险来了。蓝衣社只好再派人到会场捣乱。刚一开会，就有人说：“抗联会”不合法，不能举行欢送会；并且威胁到会的人们，马上退出会场。可是宾主双方，根本不理他们，照常开会，照常讲话。“抗联会”的代表首先指出：这次运动比赛失败，使我们得到深刻的教训。

和日本比较起来，我们的政府对体育重视很差，这是失败的根本原因。日本的运动员，在一个多月以前就来到柏林，天天在场里练习，地形已经熟悉；他们坐的是本国轮船的头等舱，吃的是自带厨师作的日本饭；他们的生活没有变化；他们有坐船的习惯，又有一个多月的恢复，因此身体非常健康。可是中国运动员和他们的情况恰恰相反。坐着意大利轮船的三等舱，队员大部分是第一次航海，沿途晕船，不能吃饭；在开会的前几天才赶到，不但没有得到练习，而且也没有得到休息；来到以后，吃不到一顿可口的饭，几家饭店愿意包中餐，领队又说不能报销。因此运动员站在运动场上，直感到头重脚轻，腹内饥饿，哪里还能坚持战斗呢！象这样的情况，遭到失败，能说是运动员不努力吗？这段义正词严的讲话，受到全场的鼓掌欢迎。但是几个蓝衣社分子，却低头不语。接着符保卢就中国的体育前途问题，作了发言。他谈得既有道理，又有热情，使会场充满了胜利的气氛。在吃饭的时候，蓝衣社分子带着失败的情绪，灰溜溜地走了。

1936年10月间，在第一次“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”之后，陈铭枢和王礼锡到了柏林。有一天晚上，“抗联会”在一个酒馆里举行欢迎会。但在开会以前，突然来了十几个“不速之客”，他们以凶恶的目光，扫视着周围，看来他们是“学生会”的打手，来找陈铭枢的麻烦。这时陈铭枢还没有到场，“抗联会”会员也还没有来齐，只有我们一部分先到的人，在那里布置会场。我们看出他们的来意不善，一方面和他们打着招呼，一方而通知陈铭枢不要到会。眼看到了开会的时候，会员还是来得并不踊跃。我们正在纳闷，忽然王礼锡和几个会员进来。他们悄悄地告诉我们：酒馆附近，有人阻止进来。我们才知道会员来得不多的原因是什么。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，我们也派人站在门外，看到会员就招呼进来。不大工夫，就到了四、五十人。我们起先耽心，破坏分子可能还有不少，但是直到开会，只增加了几个。只有那些先来的家伙，气势汹汹，摩拳擦掌，无

论如何不许开会。根据这种情况，我们临时决定：变欢迎陈铭枢的大会为争取这批“不速之客”的座谈会。先是三三两两，一边喝啤酒，一边聊闲天，以后由两、三个人，联合成五、六个人，还是说笑话，讲故事。但在笑话、故事里，有意识地包含着团结抗日问题。那些破坏分子听着，也情不自禁地笑了。空气慢慢地缓和下来。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，进行大会发言，会员接二连三地讲话，一致反对内战，主张抗日。破坏分子看看没有吓倒我们，只好瞪着两眼坐在那里。一直等到散会以后，他们才说：“以后不要再開会了，小心出事。”在这种软弱的“劝告”中，既有蓝衣社对我们的威胁，也包含着这些“不速之客”对我们的同情。可见这次斗争是有收获的。

经过以上两次斗争，“抗联会”从了解情况、分析问题中，初步总结出几点经验教训：第一，两次开会，都有特务捣乱。他们对开会的时间、地点，知道得很清楚，这说明特务分子已经打入“抗联会”内部，因此我们需要清理队伍。第二，两次来的人，都是些平时不见面的人。事后知道，他们都是小商小贩，临时被雇而来，原来预备打架动武，后来看到我们人多势众，才不敢动手。为了“釜底抽薪”，今后有必要把工作深入到华侨商人中。第三，两次来势，都是先紧张后缓和，主要原因在于“抗联会”会员能够紧密团结，冷静对待，坚持斗争。这说明今后的斗争，应该由被动转为主动。根据这一经验总结，“抗联会”很快地派人到侨商中进行工作。第一次，经过反复的打听，我们才在一座楼房的地下室里，找到一个华商的集体宿舍，里边住着十来个人。我们刚去，就认出几个熟悉的面孔。他们见我们突然而来，也有些感到意外，有的人不理睬我们，有的人故意走了出去，只有两、三个年老一些的和我们打招呼。经过我们对他们生活的关怀、询问，他们慢慢地、情不自禁地谈到了他们的遭遇。原来他们都是浙江青田人，因为家穷过不了日子，才冒着危险，偷坐轮船出国。他们大多数人没有护照，从这一国到那一国，只有偷越边境的一个办法。被人抓住，轻则驱逐，重则坐牢。他们在德

国，受尽了法西斯的虐待，三天查护照，五天查营业，弄得坐卧不安。他们每天背上一些中国货，到处流浪叫卖，简直和乞丐一样。不说赚不了多少钱，就是赚下钱也汇不出去。有不少人多年流浪，死到海外。年老人谈到痛心之处，不由得掉下泪来。就这样，讲话的人渐渐地多了，躲出去的人有的也回来了。大家的感情渐渐地融洽起来。可是不大工夫，进来一个面目狰狞的家伙，恶狠狠地问我们：“你们来干什么？”原来他就是两次捣乱的领导人。这种“人物”的出现，是我们预料到的，因此并不畏惧。我们就借着他这一问，结合着他们的实际生活，说明“抗联会”的目的，要求他们参加抗日活动，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，改变他们的痛苦生活。可是不等我们说完话，那家伙就下了“逐客令”。我们看到其余的侨商，既怕他的威胁，不敢再谈什么，又对我们的“被逐”，抱有不安的歉意。这次斗争，从表面上看，我们是失败，因为特务把我们赶出来；但从实际上讲，我们是胜利了，因为我们的工作开始深入到侨商中去了。

1936年10月间，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柏林，“抗联会”在十一月间就在“学生会”开会表示追悼。接受前两次开会的经验教训，我们对这次大会，预先作了充分的准备：开会时间、地点，用口头秘密通知，并且要求可靠的会员都在半小时以前到会；关于追悼会的布置，事前拟出方案，到时一齐动手，争取在一小时以内把会开完；转被动为主动，由年轻力壮的会员把门，限制“不速之客”入场。在开会的那天下午两点半，“抗联会”先有几个人到“学生会”，看见已经有几个特务在那里。这时“心照不宣”，都知道对方的来意。军统特务刘宏烈和另一个特务分子在大厅里打台球，意思是霸占会场，阻挠开会；还有几个特务站在旁边，假装看打球，实际是为刘等助威风。不大工夫，“抗联会”会员陆续来到。有的人在大厅里看球，有的人在阅览室看报，有的人在门口聊天。忽听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准备！”大家一齐动起手来：十几个人去抬球台，刘宏烈等想要阻拦，只听有人说：“马上要开会”，球台已经搬走了；三、四个人在

正中墙上挂起鲁迅先生的画像，那像画得惟妙惟肖，怒目对着特务分子；四、五个人在画像两边挂起一副挽联，那挽联写的是：“反帝爱国，先生不仅呐喊”，“抗日救亡，吾辈岂能彷徨”。大厅里的人们，自动整理着队伍；门口的青年，严格限制着人们的出入。只有几分钟，一切就绪了，追悼会提前半小时开始。先用口琴奏了哀乐，继向画像俯首静默，然后由陈嘉琨介绍了鲁迅先生的生平，最后高呼口号：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”。这样战斗的追悼会，没有超过半小时。待到有十几个被特务收买的侨商来破坏的时候，追悼会已经胜利地结束了。这次追悼会，既检阅了“抗联会”的力量，又打下了“学生会”的威风，收获是很大的。

1936年冬，在“西安事变”以前，报纸上就不断登载着绥远抗战的消息。“抗联会”配合绥远抗战的形势，工作有了新的开展。特别是在“双十二”事变之后，工作开展得更为顺利。不但“四号”、“五号”公开进行着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，而且在学生、侨商中广泛展开了为支援绥远抗战的募捐活动。到1937年初，“抗联会”公开筹备举行“旅德华侨庆祝绥远抗战胜利大会”，事前派代表通知程天放，要他参加大会；在华侨中进行深入宣传，并发展一部分会员；把开会的时间和地点在“四号”、“五号”公开宣布，号召人人参加。这种大模大样的做法，使敌人既不高兴，又无办法破坏。在“学生会”开庆祝大会的时候，不但蓝衣社的一部分头目到了场，就是大使程天放，也居然“驾临”了。他们来的原意，我们虽不清楚，但是他们来的效果，是实际上承认了“抗联会”的合法存在。这次庆祝会，开得也很紧凑成功。一开始就向绥远抗战阵亡将士默哀，接着就由绥远学生秦丰川介绍了绥远抗战的经过，然后用“抗联会”名义，宣布了募捐的情况，在“来宾讲话”中，我们请过坐在第一排的程天放，但是他摇头没有讲。不料前面提到的那个面目狰狞的侨商却提出质问道：“你们是学生，凭什么用华侨的名义开会？”大会主席回答说：“学生也是华侨，而且今天还有很多商人到会，甚至连我们的大使

也来了，怎么不能用华侨的名义开会呢？”那家伙又说：“你们的‘抗联会’是少数人组织的，不能用‘旅德华侨’的名义，我们不承认这种非法的织！”主席又答道：“抗联会”包括了各党各派的人，人数很多，它能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意志，它是实际存在的，你承认不承认有什么关系！”那家伙还想挣扎，可是已经引起全体“抗联会”会员的愤怒，连声命令他“住嘴！”甚至和他一同来的人，也感到他“不识时务”，向他翻着白眼。他看情况不妙，只好扭头走了。别的特务也没有再进行破坏。这次公开的斗争，我们完全胜利了。

最大的一次斗争，发生在193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。这次蓝衣社特务不是用雇用侨商的办法，直接捣乱（因为这种捣乱，每次都失败了），而是用告密的办法，请求德国警察抓人。我记得是为了纪念“一·二八”上海抗战，“抗联会”在一个较大的酒馆里开会。开会以前，没有看到来捣乱的侨商，却有四、五个大使馆的职员，坐在门口的桌子上。刚刚开会，突然进来两个德国“彪形大汉”，他们从大衣口袋里掏出证明，说是秘密警察，前来逮捕共产党人。我们向他们解释，说这是抗日会，不是共产党。他们不由分说，硬把主席黄琪翔和记录朱江户带走了。这时大使馆的几个职员，伪装惊惶，站起来要走，企图瓦解会场。我们马上识破了这是程天放的阴谋，立即宣布：不能散会，必须等黄、朱回来。这时，已经有几个会员，自动把大使馆的职员监视起来，不让他们离开会场，也有几个会员，秘密建议，要到大使馆示威，找程天放要人。我们的几个负责人商量了一下，就由连瑞琦提议，说道：“今天纪念‘一·二八’，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权利，德国警察抓人，是对我们国家的侮辱，我们应该向大使馆请愿，要他们向德国警察交涉，马上放人。”连瑞琦的话刚刚说完，张铁生接着指出：“从今天的迹象看来，捕人是大使馆搞的把戏，我们到大使馆不是请愿，而是示威，不是要他们向德国警察交涉，而是要大使馆马上放人。”这话刚完，好多会员异口同声地喊道：“对！人是大使馆叫抓的，因此我们要和大使馆要人。”同时，还

有几个会员喊道：“走！马上到大使馆！”会场群情激昂，大使馆的职员面面相觑，不敢作声。在九点左右，大家一齐涌到大使馆，进了楼下大厅，高声喊叫，要程天放马上出来。大使馆一看来了七、八十人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有两个人匆忙出来敷衍。他们起先假装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，要我们推出代表，说明来意；接着又说程天放没有在家，要我们明天再来。会员们一听这些鬼话，更是气上加气，有的人主张去搜，有的人喊着要打。整个大厅，沸腾起来。程天放看见躲不过，只好从楼上走下来。我们根据事实，指出他的阴谋，要他马上放人。他开始坚决不承认预先知道“抗联会”开会，更不承认抓人是大使馆搞的。当我们把那几个职员推到他的面前，证明他们是有计划的捣鬼以后，他还说：“那是他们个人的行动，和我没有关系。”面对这个奸诈的中统特务，会员们纷纷提出质问，揭破他们几次捣乱的阴谋，要他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的事情。对于他今天勾结德国特务，陷害自己同胞的罪行，大家更是义愤填膺，恨不得马上揍他一顿。甚至有的人已经喊出来：“打！打！打！”正在这个紧张的关头，忽然黄琪翔和朱江户走进大厅。大家一阵欢呼，吓得程天放有些发抖。这时，在“抗联会”会员当中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绪：有的人希望进一步揭露程天放和德国特务勾结的阴谋，给他一顿教训；有的人认为黄、朱被释，斗争已经胜利，愿意适可而止。程天放的狐狸眼睛，已经看出这种情形，于是趁机拉拢黄琪翔，说是：事出误会，以后注意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黄琪翔也落得就此下台，说是“改日再谈”。好多会员为了巩固内部的团结，也没有再说什么。只是在离开大使馆的时候，喊了这样两个口号：“停止内战，一致抗日！”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！”

日本投降后，傅作义部抢占包头，我作为战地记者，目睹了各个场景，下面叙述的就是我在——

国民党接收包头前后见闻

刘 映 元

（一）先从抗战第八年谈起

由1944年7月到1945年7月为抗日战争第八年。由于蒋介石保存实力，不肯把进行内战的部队用在对日作战上面，所以仍然节节败退，以致日军在1944年5月占领洛阳以后，抽调侵华日军中的精锐，向中国西南大后方出动，在占领缅甸的日军北上进入云南西南部的同时，从湘桂线南下的日军，在11月连陷衡阳、桂林、南宁、柳州等重镇，把亚洲大陆上的交通线打通，并于12月侵入贵州边境，攻占独山县城，所以当时重庆大震，有人主张把陪都迁往西康雅安。

尽管日本侵华军在亚洲大陆如此疯狂猖獗，但已成了强弩之末，不过是失败以前的回光返照，只是垂死挣扎而已。因为同盟国从1944年起，已经转守为攻，从中国基地起飞的美国超级空中堡垒，先后轰炸了日本的九州，伪满的沈阳。进入1945年，西欧战场转入反攻阶段，中国入缅远征军控制了印缅公路，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陆战队分别在中途岛和关岛登陆。此时，蒋介石将驱逐日军的任务完全推到美军身上，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如何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，以便完全独吞抗战胜利果实。

八路军和新四军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对日艰苦奋战，在华北、华东敌后建立起星罗棋布的游击根据地，使解放区南起大别